

文学研究丛书

WENXUE YANJIU CONGSHU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章罗生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11B2W120) 前期成果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章罗生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 章罗生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47-2145-9

I. ①新… II. ①章… III. ①报告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1160 号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章罗生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谭炜麟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21.5 字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2145-9

定 价: 6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与整个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相一致，新世纪报告文学在以往基础上，在总体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审美新变：

一、重建崇高。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深刻反映了寻找“意义”和重建“崇高”这一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不少作家自觉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任，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寻找新的“当代英雄”。

二、价值中立。就整体而言，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价值与立场的中立，许多作家能不为传统与成见所囿，也不被“权力”、“民意”和“舆论”所左右，相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迷雾见真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解构。

三、返璞归真。由于作家们观念的变革、思维的转换与立场的位移，因而导致其创作更加贴近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更加尊重客观现实与原始资料，也更加投入作者的真情实感甚至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其创作也就更加表现出“真实即美”的美学特征，更加具有深邃的认识价值与较高的审美意义。

四、多元发展。在艺术形式方面，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也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发展，表现出更加成熟与多元、多向的特点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更加显露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广阔发展前景。



具体而言，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继续在科教题材、改革题材、社会问题题材、历史题材和民主法制题材等方面进行了扩展与深化，但其中最为集中、突出的还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它不仅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甚至还构成了整个文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一股思潮。它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题材之集中与社会影响之广泛，可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热和 80 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热相媲美。其中影响最大或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建明的《根本利益》、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冷梦的《高西沟调查》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

二、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宏大叙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出更多的“精神承担”，同时也表现出新的审美特征，显得比以往更为集中、鲜明、细腻、深沉。首先，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的上天，科教题材尤其是国防高科技题材的作品更为集中，它们在以往“两弹一星精神”的基础上又挖掘出了“航天精神”等新的精神品质。其次，围绕三峡建设与移民、抗“非典”事件和“宝钢”建设等现实重大题材进行“宏大叙述”，挖掘和总结了“三峡精神”、“抗非典精神”和“宝钢精神”等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再次，近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还挖掘和描绘了一批堪称“民族脊梁”的当代英雄，尤其是它们深入普通“小人物”的家庭与内心，挖掘出他们的人情、人性美，从而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如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

三、与 20 世纪比较，新世纪报告文学在“英雄叙事”方面，一是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更多；二是题材更广泛，尤其更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等“小人物”；三是作家的独立性更强，更远“宣传”而近“文学”；四是艺术更精湛，手法更多样。总的来说，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是进一步表现出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具体来说，一是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重大事件和进程中，在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时彰显人物的“英雄本色”；二是将“小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



中凸现“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与顽强斗志；三是深入人物（也主要是普通“小人物”）的家庭与情感世界，着重从情与理、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等方面，细腻揭示人物的美好人性与崇高品德。

四、李泽厚曾批评“五四”启蒙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认为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事实的确如此。新时期文学中的“再启蒙”除了增添批判极“左”政治等内容外，在反封建主义和要求民主、自由等方面，仍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的确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而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则在继承前两次启蒙的基础上明显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与以往相比，它们更多的是扎实的调查采访、求实的平等交流、冷静的自我省察和深刻的理性思考，且能将“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融为一体。因此，无论是对传统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干预，也无论是对正义的申张还是对问题的探讨，它们都“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同时，它们还表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对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

五、与新的理性启蒙及“人的发现”相联系，近年报告文学创作还表现出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从《“布衣青天”杨剑昌》《根本利益》《国难》和《我告程维高》等作品来看，这种“融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再现时代典型环境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这样，也就导致了作家叙事立场的位移、观察视角的转换和文本风格的嬗变。

六、新世纪报告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问题报告文学忧患人生、理性批判的启蒙传统，在“发现”被遗忘的底层民众的同时，也“发现”了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小人物”。而这种“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融合”，既不是出于对主流意识的迎合，也不是胁于政治外力的压迫，而是作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心态的自然调整与审美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年的政治文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即在民主法制、政治文明、体制改革、以人为



本、“三农”问题等现代化进程的目标与议题上，主流意识与民间意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识。这样，也就导致了作家叙事立场的位移、观察视角的转换和文本风格的嬗变。从这一意义上说，近年报告文学表现了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与对民族心理的敏锐捕捉。

七、报告文学在文体形式上，至今还未完全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具体来说，即还未完全解决好通常所说的“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如何融合、统一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报告文学能否在保障“新闻性（真实性）”、保持“政论性（理性）”的基础上，达到小说等传统虚构文学所有的艺术成就与艺术高度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报告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迄今为止报告文学一直在为之探索、努力的问题。这一问题贯穿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始终，或者说，中国报告文学就是在其相互矛盾、彼此冲突之间发展、进步的。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们汲取以往价值选择一元独尊的教训，开始寻求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兼备、继承传统与追求现代性相统一之路，歌颂与批判、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冲突不断融合、互补，出现了一批具有审美新质的好作品，如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李景田的《未扶正的反贪局长》，何建明的《国家行动》《忠诚与背叛》和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等。

目 录

内容提要·····	(1)
绪 论·····	(1)
一 关于文学发展与“新世纪文学”·····	(1)
二 新世纪前的报告文学发展概况与文本背景·····	(3)
三 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的意义·····	(10)
四 本论著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12)
第一章 农民与土地：题材的新开拓·····	(16)
第一节 引论·····	(16)
第二节 土地、历史与农民革命 ——《革命百里洲》等·····	(22)
第三节 “草根民主”与政治文明 ——《中国基层选举报告》等·····	(26)
第四节 农民“伟人”与农村传奇的时代报告 ——《精彩吴仁宝》等·····	(31)
第五节 致富之路与执政之道 ——《贫穷致富与执政》·····	(38)
第六节 历史的沉思与科学的启示 ——《高西沟调查》·····	(42)



第二章 时代与民族：精神的新承担	(46)
第一节 引论	(46)
第二节 从“两弹一星”到“航天精神” ——李鸣生与《风雨长征号》等	(53)
第三节 “大庆精神”与“余秋里风采” ——《奠基者》	(64)
第四节 “三峡精神”与“强国梦” ——《梦之坝》等	(74)
第五节 “宝钢精神”与“抗‘非典’精神” ——《宝山》与《瘟疫，人类的影子》	(84)
 第三章 平凡与伟大：英雄的新叙事	(93)
第一节 引论	(93)
第二节 在时代大潮与人生奋斗中展示男儿风采 ——《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等	(97)
第三节 从情与理的冲突中揭示崇高与悲壮 ——《大爱无言》	(102)
第四节 在功名利禄与苍生命运间挑战传统 ——《为了拯救生命》	(109)
第五节 “打假英雄”与“红顶巨骗”的殊死斗争 ——《“布衣青天”杨剑昌》等	(114)
第六节 “反腐斗士”与腐败高官的血泪抗争 ——《我告程维高》等	(122)
第七节 无字的诗与无声的歌 ——《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	(127)
第八节 真情与博爱的清纯圣歌 ——《善良，让她如此美丽》	(137)



第四章 冷静与深刻：理性的新发展	(142)
第一节 引论.....	(142)
第二节 解读“沉重”与挑战“经典” ——胡平的《战争状态》等.....	(147)
第三节 “智慧风暴”与观念冲击 ——王宏甲的几部新作.....	(154)
第四节 民间立场与“另类”话语 ——《革命百里洲》与《中国基层选举报告》.....	(167)
第五节 “科学的分析”与“清醒的理性” ——《第一种危险》等.....	(174)
第六节 余论：“人的发现”与以人为本	(185)
第五章 歌颂与批判：冲突的新融合	(193)
第一节 引论.....	(193)
第二节 “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 ——何建明与《根本利益》等.....	(197)
第三节 沉重的崇高 ——《为了拯救生命》与《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	(204)
第四节 从“遵命文学”到“为民代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	(208)
第五节 余论：知识分子自我的重新定位.....	(210)
第六章 传统与现代：形式的新探索	(212)
第一节 引论.....	(212)
第二节 胡平对学术体的构建与对“思想美”的追求.....	(220)
第三节 赵瑜的新探索.....	(231)
第四节 李景田对小说艺术的借鉴.....	(236)
第五节 何建明：以典型人事与细节描写取胜.....	(240)
第六节 罗盘、张雅文：主体投入、散文笔调与诗意风格	(247)



第七节 王宏甲等：对“文学性”、“理性”与“新闻性”的疏离	(252)
第八节 结语	(258)
主要参考文献	(260)
附录一 作者报告文学研究主要学术成果与科研业绩	(263)
附录二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研讨会及其反响	(269)
一 北京研讨会报道（贺信）选	(269)
二 评论与书讯	(292)
后 记	(327)

绪 论

一 关于文学发展与“新世纪文学”

本论著名为“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按题旨，必须首先谈谈“文学发展”和“新世纪文学”，然后再谈“新世纪报告文学”。因为，论“创新”或“审美新变”实际也是论“文学发展”，即从“创新”或“审美”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发展变化。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发展”，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理解“文学发展”呢？专家告诉我们：“文学发展就是文学本体的发展，如前所述，是在历史、现实的过程中，首先是文学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与这一层次相应，表现为文学话语的不断变革、文学体裁也即真正的文学这种形式的不断生成、更新与多样化。其次，是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的创造的发展，与这一层次相应，就是创造主体的个性、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生成，就是各种创作原则的形成与演变。再次，是文学接受中审美价值的再创造，与这一层次相应，表现为历史过程中文学价值不断被再创造，形成文学的接受史。”^① 这应该是我们考察“文学发展”的理论指南，也是研究报告文学“创新”与“审美新变”的理论依据。因此，本论著也试图以此为指导，从以上几方面进行考

^①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总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察和论述。

关于“新世纪文学”，目前学术界已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早在几年前，有人就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例如，关于日益成熟的市场运作究竟是镣铐还是翅膀，关于全球化视界下的本土立场究竟包含哪些要素，关于高科技对文学广泛的、潜在的控制，关于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关于多媒体时代更为多元的审美意识，关于汉文化价值伦理的重构和思想的渗透，也即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资源问题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发问：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段已经来临？“新世纪文学”以2000年作为表征性的起点，这种武断一方面使得“新世纪文学”由对时间的随机截取变成文学发展有意识的中断，掩盖了“新世纪文学”的传统及其共性；一方面又悬置了对其命名所依据的文学新质。然而，我们暂时提不出比“新世纪文学”更合理更需要的概念了，只是必须作出如下“特别理解”：这是借“新世纪”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味的时间概念，来对2000年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实践作出的笼统概括，它把对文学阶段的指称从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依赖变成对时间的依赖，从而潜意识地解构了新文学以来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充分地展示新世纪文学在自律与他律的和谐中构筑未来的发展蓝图。^① 还有人认为——

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

^① 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第4期。



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①

这就说明，“新世纪文学”不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其独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确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呈现出“大量新质素”，表现出许多新特点；的确是“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其创作“更见个性化”，其理论批评“更具宽容性”。而作为“文学”之一的“报告文学”，也与这整个发展趋势相一致，也表现出新的发展与审美新变，也有其独立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二 新世纪前的报告文学发展概况与文本背景

笔者认为，从和合学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中国报告文学的百年历史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体现出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而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逐步成熟与自觉，正是报告文学这一新生事物遵循其自身内在规律而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和合学认为，凡存在都蕴涵着冲突与融合（简称融突），一切融突存

^① 白桦观点，见张东梅：《现状·反思·展望——“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第4期。



在都是和合存在；^① 在一个和合体中，有冲突、融合，事物才能改变性质，获得新生。^② 用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激烈冲突的 20 世纪，报告文学也始终处于冲突、融合的过程之中，正是它在“新闻性（真实性）”与“文学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理性）”、歌颂与暴露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激烈冲突，报告文学才得以发展、进步，才走向融合、新生。综观中国报告文学百年来的发展与变革，它清晰地呈现出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和六个不同时期：第一阶段，从 1898—1976 年，报告文学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徘徊而未能找到自我。具体来说，1898—1929 年，为萌生、形成期，报告文学在近现代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与中西文化冲突中诞生；1930—1956 年，为成长、发展期，报告文学主要在“新闻性（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冲突中发展为文学化的“新闻”或新闻化的“文学”；1957—1976 年，为萎缩、衰败期，报告文学在政治与文学的外在冲突和“歌颂”与“暴露”、“倾向性（政论性）”与“真实性（新闻性）”的内在冲突中发展为政治化的“新闻”或新闻化的“政治”。第二阶段，从 1977—1989 年，报告文学在兴盛与躁动中融突、蜕变。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1977—1985 年，为恢复、革新期，报告文学在“歌颂”与“暴露”、“倾向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中赢得独立地位，实现融突后的质变；1985—1989 年，为兴盛、躁动期，报告文学在兴盛的同时，因“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冲突而在新层次上出现新的危机。第三阶段，从 1990 年至今，为成熟、自觉期，报告文学在全面融合中逐渐走向成熟。即在“文学性”与“理性”、“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文史哲等方面实现全面融合，从而完成新变，走向自觉。

如果我们把梁启超 1898 年写的《戊戌政变记》等当作我国最早的萌芽状态的报告文学作品，^③ 那么，从此时至 1929 年，可视为报告文学的萌生、形成期；而从 1930—1956 年，则视为报告文学的成长、发展期。

① 李亚彬：《和合学的建构》，《光明日报》1997 年 7 月 5 日。

② 张立文、包霄林：《和合学：新世纪的文化抉择》，《开放时代》1997 年第 1 期。

③ 见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第 22 页。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在 1930 年前,报告文学还处于没有理论指导、没有确立文体意识、甚至没有明确文体标名的“自在”阶段,而 1930 年后,报告文学则进入了有理论指导、有文体意识与文体名称的“自为”阶段。其重要表现是,在引进国外报告文学理论与“左联”倡导报告文学创作运动的同时或稍后,一些文艺理论家与作家如茅盾、胡风、袁殊、周立波、夏衍、魏猛克、以群等,也对报告文学的性质、特点、功能等作了认真、深入的理论探讨,从而奠定了我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基础,也指导和推动着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概括说来,他们的历史贡献是:明确了报告文学“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的基本特性,肯定了它是一种与小说、散文等同样重要的新兴战斗文体,它具有批判现实、反映人生、干预生活等社会功能。但从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就存在着分歧或不足,其集中点是这种文体的属性,即报告文学究竟是如小说、戏剧那样的“狭义文学”,还是如诸子散文、现代杂文那样的“折中义文学”呢?^①对文体属性的认识不同,就导致对报告文学基本特性的认识、理解与强调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到创作实践中,就形成了“新闻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冲突而影响、制约其发展。胡风、周钢鸣、魏猛克和夏衍等人认为报告文学不是小说那样的纯文学,因而不允许“虚构”、“想象”之类,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其“新闻性(真实性)”与“政论性”等特性。而茅盾、袁殊、以群等人则将报告文学作为小说、戏剧那样的纯文学或“狭义文学”进行规范,因而将“文学性”摆在首位而加以强调。由于对文体属性的认识不同,就导致对报告文学基本特性的认识、理解与强调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到创作实践,就构成“新闻性”与“文学性”等方面的内在冲突而影响、制约其发展。

在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虽然出现了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

^①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认为,文学有广义、狭义和折中义之分,广义文学泛指一切口头文学或书面作品,即不仅包括今天所谓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狭义文学专指今日所谓文学,即情感的、虚构的或想象的作品,如诗、小说、散文等,介于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之间而又难以归类的口头或书面作品,即可称之为折中义文学。如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现代杂文、纪实文学或某些风格化政论文,它们既可归于广义文学类,有时也不无道理地被归入狭义文学类。



民图》、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以及华山的《英雄的十月》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名篇佳作，但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和独立地位仍未确立。还有人认为“报告文学是小型作品，是片断的，短小的散文”，“是‘低级文学’作物，是在没有足够熟练的技巧写小说之前的一种写作形式”，它仅仅是“达到伟大作品的阶梯”^①。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因写“光明”、“歌颂”等指导性方针的提出，作品凡表现解放区生活的，均立足于歌颂，这已成为主要倾向。此外，对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确立，使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将作品的政治效应作为其成败得失的依据，因而作品的内容转而以政治层面的评析替代了以往的社会批判。这一现象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也就是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报告文学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相冲突的同时，又开始了“歌颂”与“暴露”的冲突；与此同时，政治也开始介入文学并与之冲突。

新时期报告文学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读者与社会的热烈欢迎，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由附庸蔚为大国”，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文学与政治实现融合的大环境下，实现了政论性与文学性、倾向性与真实性、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歌颂与暴露等方面的融合。而这几种冲突的融合，实际上是解决了报告文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在这方面，首先要归功于徐迟、黄宗英等人的知识分子题材。徐迟的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为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立传的系列作品，承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报告文学歌颂党和领袖，歌颂祖国和人民的传统，同时又开辟了新时期歌颂科学家、知识分子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新路。但不同于以往从政治、概念出发的廉价的甚至是虚假的歌颂，徐迟、黄宗英以及理由、陈祖芬、乔迈、肖复兴、孟晓云等人的歌颂，一是其对象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即将原来的批判、否定对象（科学家等知识分子）变为肯定、歌颂，二是将歌颂与批判、揭露有机结合。他们的贡献则在于对社会主义时期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大胆探

^① 见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载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报》创刊号。